

重点  
阅读

## “烟火气”与“正能量”

——简评戴希小小小说的创作特色 □白庚胜

戴希是中国小小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从事小小小说创作近30年,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小小小说作品。他的小小说深入生活,描绘老百姓恋爱、婚姻、工作、养老等诸多层面的现实状况与所思所想,既展现了当今时代的“烟火气”,又处处散发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戴希作品的烟火气,是指他喜欢从百姓视角出发写原生态的生活,不修饰、不掩饰,也不提炼高大上的道德教条,但有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生命高度。百姓的原生态生活里,大多数人非常质朴,所以铁柔的出征无需拖泥带水。而在艰难时刻,百姓的凝聚力也超常强大。铁柔出征之后,单位领导和同事主动照顾其病重的父亲,尤其是唐小曼,原本与铁柔在恋爱、工作上均有些许旧恨,但此时此刻却放下昔日嫌隙,竭尽所能去照顾铁柔病重的父亲。这并不虚伪,相反非常有生活温度、有烟火气。新冠疫情不仅将医生变成了战士,还深深地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认知。留守在后方的老百姓在抗疫情绪的感染下,很多人跨越平日的心理栅栏,以自己最初的良知为抗疫尽一份力量。所以唐小曼对铁柔父亲的这种照顾,既是对国家抗疫工作的默默支持,也是最真实的一种人性。这种温情和人性,没有经历过疫情硝烟的人很难体会到。

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比较简单,但这种简单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戴希长期在地方部门工作,对老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多作品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同时也看到了老百姓的生命气度。比如《其实很简单》中,见义勇为的小伙子本是非常胆小之人,在抢救发生现场,那么多人冷漠围观,他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其理由很简单——只是为了不在自己儿子面前做蠢种——父亲的尊严让他成为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真实精神和生命气度,没有义薄云天的侠情,但依然可以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好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形态,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事迹,但有满满的人间生活的烟火气。

戴希作品烟火气的基础是人性、是慈悲。

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老百姓的原生态生活中有最珍贵的懂得和慈悲。《一串佛珠》中的海力为了要回以前送给“我”的礼物——一串已经升值的佛珠,费心编了一个曲折的情感事件,二人的友情在一串佛珠面前变得尴尬。小说讽刺了拜金主义思想,但态度是温和的。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说中,佛珠最后安然物归原主,这有一种老百姓的生活智慧。无意中收取了朋友价值百万的礼物,未及人情太重,换位思考,也许物归原主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母亲》中的杀人犯杀人后,不想在母亲面前杀人,他放下手枪,乖乖就擒,残忍之人,也会有一个人让他心生不忍,这是人性。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倡导正能量。作为文学作品,传播正能量是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戴希的写作视野比较宽广,古今中外无一不可成小小小说,不管是对老百姓原生态生活的抒写,还是对国家热点话题的关注,作品传达出来的都是一缕缕的正能量,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等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尤其对人性良知的重视,与中国古代哲学相通,对当下社会的人格教育有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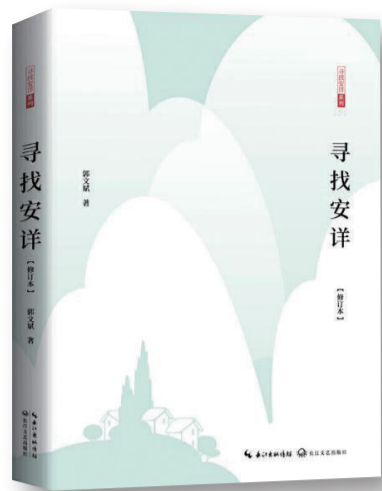
他的小说传播正能量比较常用的手法是通过故事内容启人深思。比如《鹿战》借古代诸侯争霸故事来思考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齐楚两国争霸,齐国大臣仲渊献策,以高价收鹿为计,扰乱楚国的经济基础。楚人奔走捕鹿,甚至废粮田、种草养鹿,以致粮库亏空,最终被齐国打败。这个故事故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范围地弃农从商并不值得鼓励,对于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以此类推,实体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戴希最注重感化、救赎的力量。他喜欢写历史题材小小小说,其中《特别赏赐》和《死亡之约》都是写唐太宗治国之事。《特别赏赐》写唐太宗治岳父长孙顺德贪污。岳父贪污,惩治难度自然较大,但不治又不行。于是,唐太宗想出“特别赏赐”一计,将长孙顺德贪污罪罚归罪于自己没有赏赐他,于是特别赏赐50匹绢帛,让长孙顺德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屈尊弯腰,将50匹绢帛的赏赐背回家。人问其故,唐太宗说:“只要长孙顺德还有人性、良心未泯,那么,朕在众目睽睽之下加倍赏赐绢帛

给他的羞辱,是不是会判他下狱伏法更剝心?”事实果如唐太宗所料,长孙顺德深感羞愧,特别沮丧。《死亡之约》写唐太宗与死囚盟约之事。死囚们的临刑心愿是想回家看亲人。唐太宗心生怜悯,遂与死囚盟约,准其回家看望父母妻儿,但一年之后须准时返回伏法。这是一场赌博,唐太宗赌死囚的良知。一年之后,这些囚犯如约返回,唐太宗大为感动,赦免其罪。在这两篇小小小说中,唐太宗是正能量的代表,代表反腐力量,对手在与其的博弈中也吸取了他的正能量,最终变成了正能量的一方。长孙仁德后来把泽州治理得非常好,死囚后来参加卫国战争,为国捐躯。知恩图报、皆大欢喜或壮烈殉国,这是中国人喜欢的结局,也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治国讲究“怀柔远人”,讲究“修文德以来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感化、救赎的基础是良知。明代王守仁讲究“致良知”,“致知”是“致良知”,“格物”就是“正物”,将我的“良知”扩充、推广、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以使事事物物归于正,使事事物物与我的“良知”相符合。通过“良知”完成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完成人对社会的责任。在戴希的很多小小小说中,良知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对良知的重视是一种很好的人格教育,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仅中国古代圣贤这样认为,而且国外也有这样的学术观点。著名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就在他的学说中提出,“良知是人的无意识的一部分,是人存在的核心和完整人格的来源”。所以,他特别重视良知的作用,认为良知是人的本能,是在任何情境中都不会被削减的部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影响我们,最终决定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我们的良知。在上述小小小说中,无论是《柳暗花明》中的小曼、《其实很简单》中的小伙子,还是《特别赏赐》中的长孙顺德、《死亡之约》中的死囚,他们的选择都是某一刹那内心深处的良知起了重要作用。戴希对良知的重视,折射出不同流俗的审美取向。

总之,戴希的小小说创作既有生活温度,也有思想高度和人性深度,表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尤其是他以坚定的写作立场,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与情绪世界,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品格。

## 茶香茶座



我把《寻找安祥》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视为对湖北对武汉的一份祝福。本书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0年来重印了14次,是拙著之中发行量最大的一部。在此,向所有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传播的仁者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中华书局改制,我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较低的折扣批发到书,自然就无法像从前那样向全国大面积捐赠。为此,我决定把书稿移出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有许多出版社要出,但我最终还是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这些年,我的长篇小说《农历》、散文集《永远的乡愁》、随笔集《醒来》都在该社出版发行,合作非常愉快。特别是在向全国捐书的过程中,发行部尽心竭力,能够让所捐之书以最快的速度发往目的地。

没想到在报选题的过程中,疫情出现了。一直到7月,书还不能上市,这可急坏了一些爱心人士。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曾联系责编程华清,可否给方舱医院的患者每人赠一本《醒来》,无奈出版社也瘫痪了。我只好和宁夏的几位同道把银川能搜集到的书全搜齐,发往武汉。出版社恢复营业后,我又让其给宁夏的援鄂医护人员发了一部分。《醒来》是《寻找安祥》的姊妹书,报选题时名为《寻找安祥II》,后来被编辑改为这个书名。

在我同意把《寻找安祥》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后,程华清就向社里报了“寻找安祥书系”选题,计划陆续把我的书出齐。但就在我们商量协议的时候,新冠疫情暴发了,《寻找安祥》的发行就进入了一个长达半年的断档期。

其实疫情期间,我完全可以借故把书稿给别的出版社,但良知让我无法这样做,就在一种焦灼的心情中等待。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特殊

## 沿着长江再扬帆

□郭文斌

的年份,更要随缘,更要体贴人。何况,这是武汉,这是湖北。但是爱心人士还是等不住了,决定换书捐赠。我只好向她委婉地说明情况。让我感动的是,她马上决定继续等待。

无疑,这是一堂再好不过的安祥课。一年来,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它们都是我生命中的黄金。

正是这种大爱,让这本书走向它的缘分,让许多抑郁症患者得以痊愈,让许多矛盾家庭得以和好,让许多问题青年得以康复,让许多睡眠障碍者重回梦乡,让许多迷路者找到了人生方向,让不少万念俱灰的人重新燃起生命的热情。不少读者在受益之后又大量捐赠,不少企业和传统文化平台把它作为教程。

2018年仲夏,经刘广平推荐,我到北京金色世纪公司讲了一次课。不久,董事长李祥正就安排公司批发了一万册《寻找安祥》,把它配置在全国各大机场

和高铁的贵宾室,让大家带上飞机阅读。银川当代美术馆馆长刘文锦在微信中说:“很久没有哪本书让我如此爱不释手,着急赶回去是为了马上看到一本书,准备从‘现场’和‘勤’践行,并进而记于心,融于识。”不久,她就组织了第二届企业文明论坛,并向开发、服务、运营等领域常态推进。该模式很快被山东在平农商行的张兆起会同宣传、教育、广电等单位,推广于齐鲁大地。

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无疑给了我无尽的前行动力,让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公益事业。

疫情过后,向我索要《寻找安祥》的朋友一下子多了起来。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大方地赠送,而是像一位守财奴一样,把存档书送给最需要的人。每当朋友们读了后,向我反馈中获得了一丝放松、一丝安全感,我就更加渴望出版社能够加速出版,让书尽快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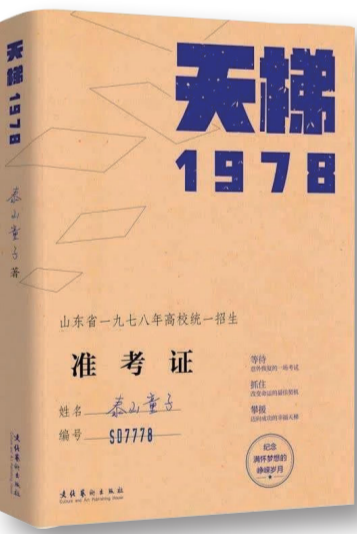
好在多年的安祥实践,让我学会了从缘分角度想事。我心想,为什么恰恰是2019年,《寻找安祥》要作别中华书局,并且全国那么多出版社,而自己却偏偏钟情长江文艺?再讲,在凶猛的疫情让整个类都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一部书稿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

记得2006年我开始倡导安祥生活方式的时候就讲过,如果人类不调整发展模式,不调整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不和大自然和平相处,一定会面临巨大困境。

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安祥,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安祥。十多年后,回味当年说过的这些话,别有一番感慨。

现在,《寻找安祥》又要从武汉出发,沿着长江扬帆了。带着它的祝福,我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美丽的缘分由此展开。

## ■开卷絮语



## 一部具有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佳作

——读泰山童子长篇小说《天梯1978》 □黄发有 孙涛

放弃对知识的追寻,他的性格始终是健全的、自足的,即使在最为失望与消沉的时候,他也能够通过自我宽慰来与现实达成暂时的和解,并在失败中积蓄力量,准备接下来的振翅飞翔。或许,这便是米双远这一形象的深刻意义所在——在极度艰难的境地中,人们依然可以通过理想的感召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并由此获得继续奋发向上的强大力量。

小说围绕米双远由出生到参加高考的一条主线,作者还插叙了米氏家族及其亲属在动荡历史中的种种遭遇和坎坷,这些情节看似游离于小说的主线,实际上仍可看作是作者追寻和表达那段艰难岁月中精神力量的一种尝试。米氏家族如此重视子孙的教育和读书机,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中显得如此稀缺,又如此珍贵。在米老大大为了让孙子读书而四处奔波多方筹谋中,在父亲和叔叔在帮助米双远备考期间一封封事无巨细、呵护备至的信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对知识的那份虔诚和信仰,也正是这份倔强和坚持,成就了米双远在恢复高考之后能够迅速地抓住机会,脱颖而出,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小说中,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有描述泰安风物历史、人文景观、神话传说的一些段落,作者热爱故乡,讴歌家乡之情充盈字里行间。在作者舒缓从容、妙趣横生的笔下,泰安的诸多风俗、历史、景致无不鲜活生动,令人向往。如当地流传的胡大仙和黄仙姑的传说、摊煎饼的各道工序、小孩子过“百日”的礼俗等等,无不体现了农耕文明与齐鲁文化孕育出的民间智慧与地域性格,它们不可复制也不可替代,不光吸引了读者,也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底蕴。

《天梯1978》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作者采用了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借鉴吸收了传统小说的手法,跌宕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丰富的传奇色彩。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多用白描,通过细腻的行为描写与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

文学反映现实,也记录历史。从总体来看,《天梯1978》站在了时代高度,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准确把握住改革巨变中的生活脉络与心灵激荡,是一部具有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佳作。对米双远们来说,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本身传达出了强烈而积极的社会变革信号:从此之后,所有人都获得了同样的平等的考试机会,如米双远一样千千万万的一代人,乃至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再也不必因为外在的诸多限制而陷入彷徨和不知所措,他们的努力从此不会白费,而他们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从此,青年人有了梦想,国家有了希望,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而这,也正是本书所昭示的深远意义所在。

## ■新知新思

这是一本非常独特而且好看的书。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此前似乎没人这么写,也没见过以这种思维方式和多维视角来比较和讲述中国与德国的思想与艺术的散文著作。单是这种比较方式本身,就已算得上是蹊径独开了,而其选择的东西方代表人物,一个个均是“自带魅力”的典型,恰如该书副标题所提示的“一七几几年:曹雪芹康德们的故事”,这本身即构成了一种颇具玄机的“异态搭配”,让人一望而生阅读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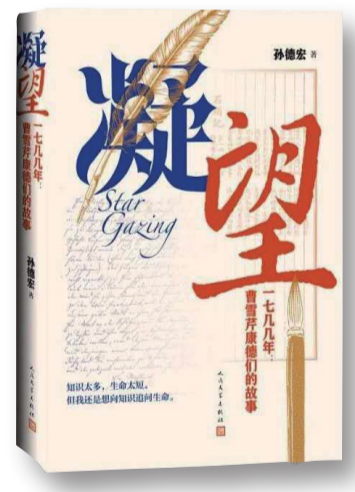
作者选择以大散文的笔法,来演绎这些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高深奥义,更使这些原本晦涩艰深的哲学原理和文言古语,变得通俗雅驯,让人读起来虽然说不上轻松,却也不那么累了。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写作这几大篇散文,确实是把那些语屈聱牙统统留给了自己,而把明白晓畅奉献给了读者。

结构全书的关键性枢纽,就在于作者慧眼独具精心编织的那个“时间轴”——它既是一个时代的坐标,又是一个生命的刻度;它无处不在,贯穿全书;它使书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有了时间的标记,同时又使遥远的东西方各自获得了“同场对话”的机缘。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时间轴”的巧妙设计,才使得原本散乱无序、互不搭界的人物、事件、爱恨情仇、思想论战……顿时拥有了时空上的贴近性和理论上的可对比性。

一七几几年,是这个“时间轴”的中心点,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终止点。作者的匠心就在于,把所有已经出场和即将出场的人物,把先后发生的事件和东西方不同领域中的故事,完全依照自设的“时间轴”来重新排序。举例来说,如果依照年龄和辈分,也许康德和曹雪芹这两个人并不适宜放在一起比较,曹雪芹出生比康德早25年,整整差了一辈;而曹雪芹40岁就英年早逝,则在1764年,而长寿的康德直到1832年才以83岁高龄离世,两者又相差68年;他们分别生活在地球的两端,同时在世的时间只有短短15年。不过,作者显然更看重的是两位大师的同一性和可比性:他们都是文学家(诗人);他们的生命中都充满了“逃离”;他们都试图揭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内在和外在的根源;他们都是追梦人……这些独属于他们的同一性和可比性,内涵阔大,意境悠长,影响深刻。于是,作者将他们“编织”在自己的“时间轴”上,顿时让不合常理的两代人,变成了处在同一时空下东西方文学天宇中的“双星星”。用这种方式,作者把书中写到的几乎所有不对称的比较对象,都要妥帖地安顿在

## 融汇文史哲 凝望东西方

——读孙德宏散文新著《凝望》 □侯 军



自己的故事框架中,没有一丝的违和感。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无形的“时间轴”的神奇法力。

作者编织的这个“时间轴”,固然是以时序为呈现的表象,但其内蕴却并非仅是时间的前后和偶然的巧合。作者在“时间轴”里注入的核心元素是彼时彼地的“思想演变”和“精神觉醒”,作者围绕“时间轴”所要展现的思想演进展开的。必须承认,这是极富挑战性的一件难事,单是通读一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于一般人而言都是难以持续的苦差事,何况还有三位不亚于康德的“思想巨子”?然而,作者却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发微探奥的勇气,把这些哲学观念梳理得条理清晰,归纳得简单明了。

相比于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庞大理论体系,东方的哲学似乎感性一些,且论述也多是直观的阐发而较少层层递进的推理。全书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赋予了写出不朽巨著《红楼梦》的曹雪芹。作者以严谨的考证梳理其身世,以诗意的语言描摹其爱情,以飘逸的笔触展现其追求人自由自由的瑰丽梦境,也不吝彩墨勾勒这位旷世奇才的多舛命运。

接下来,作者却看似随意、实则有心地选择了两位行为处事均有悖常情的人物来进行另类的解读,这就是东方的袁枚和西方的席勒。前者在“学而优则仕”的浓郁空气中放弃

功名,逃出官场,回归“随园”,悠游半生,活出了另类的精彩;后者本是皇家军队的军医,却费尽周折“逃离”出来,成为一个衣食无着、四处流浪的诗人剧作家,不但以才华横溢的戏剧创作彪炳史册,更以一曲《欢乐颂》昭示出因自由而获得的内心充盈和无比欢乐。在我看来,全书最精彩、也最耐人寻味的章节,当推第四章《袁枚与席勒:孤傲与欢乐着》,这是两位拒绝循规蹈矩、抱定自由心态、不惜放弃所有既得利益,矢志于追求个性表达和人生欢乐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事实上,此后在第五章中所写到的东方的“扬州八怪”和西方的“音乐七大师”,还不是依旧沿着袁枚和席勒所开辟的人生道路,在九曲回肠中栉风沐雨,在颠沛流离中披荆斩棘,最终则是“水流千遭归大海”,在追求个性解放和坚持心灵自由这一共同点上“殊途同归”。我尤其欣赏作者为这个终结乐章所拟的标题:“自由心灵,温暖灵魂”,真是画龙点睛、一语中的!

所谓“大散文”是融合了抒情散文、历史散文和文化散文的特点,将“诗、史、思”融汇于一体,以史为经,以诗为纬,以思为纲,三者融会贯通、纵横捭阖。其间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手段就是“夹叙夹议”,作者的“夹叙夹议”乃至“以叙带议”“以议叙叙”等行文手法极为娴熟,那些不经意间“点缀”出来的几句议论,往往令读者心领神会豁然开朗。那些要言不烦、力道十足的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恰恰是本书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孙德宏担任北京一家报社的社长。我在畅谈他的《凝望》时,常常有一种时空错位之感,除了书中人物故事令我感到时空错位之外,我对作者在书里书外的现实角色,也禁不住心生好奇:作为一社之长的孙德宏曾述说过当下报业运营之艰难,也曾委婉地叹息过自己无暇读书写作的苦闷与焦虑。而今,他却悄然拿出了如此厚重的一本专著,我曾戏说这本书是散文书中学术性最强的,学术书中文学性最强的——然而,这两门大学问却都不涉及他的本行新闻学。我不禁猜想,他在管理报业的百忙之余,悄悄抽身而出,躲进哲学、美学、文学和历史的象牙塔,曲径通幽,迷不知返,沉浸其中,陶然忘归……这,该不会也是对现实诸多繁杂的一种“逃离”吧?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由我作答,只能留待作者来自答了。